

网络出版物著作权侵权成因及 对策分析

——基于传播学的分析视角

/ 张彦华

【摘要】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介，网络出版物信息传播方式和传送渠道日益融合，使得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界限变得模糊。从大众传播及人际传播等视角切入进行研究，有助于找出网络出版著作权侵权泛滥的深层次原因——制度“编码者”的主观意图与“译码者”（受众）对“编码”的客观解读效果之间的冲突，以及网络出版产业链中各个环节“把关人”角色失范等因素。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加剧了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发生。针对此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解决，即加强“编码—译码”过程建设，发挥制度的“信号”示警作用；注重“把关人”之间关系的塑造，加强网络出版物著作权开发；建构著作权次级交易模式，创新著作权合作盈利模式。

【关键词】网络出版物 著作权 编码—译码 把关人

【作者信息】张彦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专业博士生。

DOI:10.13786/j.cnki.cn14-1066/g2.2014.04.025

作为信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网络出版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日益明显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其重要性不容置疑。但是，随着出版产业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加速融合，网络出版产业在获得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遭遇了一系列严重的著作权侵权问题。作为一种专业的传播媒介，网络出版物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等因素均与大众传播的属性相契合，所以从传播学视角出发对网络出版物著作权侵权问题进行考察，更有利于此问题的解决。

一、我国网络著作权侵权现状考察

网络传播具有的即时性、互动性、分众化、娱乐性、全球化等特点，大大增强了网络出版的魅力，但同时也导致了网络出版物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泛滥成灾。

就侵权范围而言，我国网络出版物著作权侵权范围呈逐步扩大趋势：被侵权作品类型已从最初单纯的文字内容抄袭向图片抄袭、视听作品抄袭，以及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内容抄袭等扩展——侵权的科技含量逐渐提高，也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作品类型；被侵权对象的范围从著作权权利人个人扩展到著作权权利人组织，包括

“方正告暴雪字体侵权案”“谷歌数字图书馆侵权”等；众多的网络出版物著作权侵权案涉案各方的地域范围从国内延伸到全球范围，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

就侵权规模而言，我国网络出版物著作权的侵权数量呈日益扩大态势。仅以浙江省为例，2005年浙江省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的诉讼标的总金额为1 039万元，2006年为1 166万元，2007年为2 613万元，2008年为3 495万元，2009年1-5月为1 472万元，侵权规模呈不断递增的趋势；就侵权数量增长速度而言，该省2005年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占著作权纠纷案件的13.92%，但2006年、2007年和2008年则已上升到55.71%、63.25%和60.62%，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在著作权纠纷案件中所占比例逐渐攀升。^[1]

就相关保护制度的制定与执行状况来看，还存在制度缺陷和执行过程不当的情况。单就前者而言，制度暴露的缺陷或漏洞，不但使守法者的机会成本增加，而且需要承受更多的社会压力。这是因为，漏洞或缺陷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道德的不容许，但同时也意味着可以迅速达成某件事情的机会。守法者鉴于对道德等底线的坚守，绕过漏洞的捷径来完成事情，其花费的时间、精

力和资金等成本要远远超过侵权者，但侵权者除了牺牲道德，获得了时间、精力和资金等方面的优势。但就其所牺牲的道德而言，尽管其强大的负外部性为社会整体所负担，但就其个体而言，在外部不易发觉其行为的情况下，其行为成本基本可以忽略。即使被外部发觉并举报，后者也可以通过漫长的诉讼手段来给前者制造压力或增加损失，以图通过此举来警告那些试图揭发其行事的更多人。如果从制度层面和执行层面对缺陷或漏洞加以弥补，则可以从根源上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然而不幸的是，已经有相似情况在国内发生。《1998-2009年我国著名网络版权侵权案》的统计结果显示，在2007年发生的“方正告暴雪字体侵权案”中，该公司在此法律纠纷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人力和金钱，仅用于支付案件诉讼费等资金就达到300万元。然而，经过漫长的诉讼后，方正公司最终胜诉却仅获赔140万元，损失惨重。^[2]如果上述事例仅是个案，那么来自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的另外一项调查数据则无疑更令人担忧。该数据显示，在2005年至2009年5月期间，浙江省个案的最高赔偿额仅为32.8万元，最低仅有230元，而平均判赔额只有2.07万元；不仅没有出现专利、商标侵权纠纷常见的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赔偿请求和判赔额，而且平均的判赔额也大大低于同期知识产权案件的平均判赔额。^[3]

二、网络出版物著作权侵权的传播学成因分析

随着电子硬件的生产、信息传送等技术手段的升级及内容互动技术的发展，网络出版的传播方式和传送渠道出现了日益融合的趋势，这也使得其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对网络著作权侵权问题产生的原因从大众传播及人际传播等方面进行深层次分析和把握，有助于对症下药，从源头解决网络出版著作权侵权泛滥的现象。

1. “编码者”的主观意图与“译码者”解读的客观效果之间的冲突

斯图尔特·霍尔的“编码—译码”模式认为，具有明显或隐含意义的符号被“编码者”即传播者用来建构各种具有含义的讯息，这种编译的过程是富有选择性的，并服务于特定的目的；但是，“译码者”即受众在接受讯息时，往往受到固有观念或其他因素的影响，并不完全按照“编码者”的意图理解，他可以进行变通解读，甚至产生完全对立的效果。^[4]制度的制订过程同时

也是“编码者”即执政者运用语言符号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包含执政者的思想倾向。制度中所包含的信息，经过广大受众的“编译”，即使一切顺利，也很可能会出现和“编码者”意图不一样的情况。如果制度中存在缺陷，或受众生活的环境中出现了和制度相抵触的因素，就加剧了受众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视野，通过变通等方法来解读制度传达讯息的可能性，甚至不排除出现对讯息的本意进行“策反”解读的情况发生。

从我国著作权保护制度的制定情况来看，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首先，从我国针对网络出版物著作权归属问题所制定的相关法律制度来看，虽然目前相关的法律制度较多，但却均忽略了对1995年网络出版出现之前的出版物的网络著作权归属问题作出明确而严格的界定。对于网络出版产业生产链中的部分传统出版社等企业来讲，这意味着可以采取模糊化处理著作权归属的方法，免费使用某些内容来获利，然而却给相关权利人带来了很大损失。其次，从网络出版产业的行业机制来看，亦存在很多漏洞。以网络出版产业中的电子书行业为例，其行业准入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一些实力不强或不具备从事电子书产业资格的企业进入该市场。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获得发展，一些企业开始提供大量非法的内容下载业务，甚至还出现许多阅读器生产厂商非法预装未得到授权的出版物的状况。另外，由于电子书的加密和认证标准的不统一，导致大量模糊区域的存在，不仅为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发生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从侧面造成了网络著作权归属问题的模糊与紊乱。

除上述状况外，目前国内针对网络出版物著作权侵权问题所制定的法律制度，往往仅针对眼前的情况，缺乏从长远范围内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随着考虑问题视角的限制，以及时间的推移等因素，新的状况不断发生，原有制度的漏洞也不断出现。企业游走在法律边缘，或在法律漏洞内行事，相对严格遵守法律制度的企业来讲，可以在获取更大的自由度和行事空间的同时，有效节省其成本及获取更大利益，且在某种程度上免除了受法律制裁的风险，因而富有吸引力，并会形成一种如此行事的偏好。由此而形成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不仅会造成不良企业的增多，而且更会形成整体企业的一种文化或潜规则，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危害了整个行业得以健康运行的基础。由此可见，这种存有漏洞的制度的存在或制订，及由此所传递的信号，容易被误解、曲解甚至利用。如果政策制定机构不采取措施对此状况进行扭转，此信号会容易被存有侥幸心理、非法经营的企

业或个人解读为对该类行为的一种另类的纵容，从而产生与法律制定者初衷相反的效果。更为严重的是，因为一些漏洞的存在及补救措施的不力，导致侵权者可以在合法的外衣下进行非法的活动，并得到巨大收益。进而使“编码者”的主观意图与“译码者”解读的客观效果之间出现了很大冲突，甚至出现了完全背离的情况。这种状况的出现，无疑是对严格从事著作权保护的企业、个人和相关法律制度的一个讽刺，也有导致网络出版物著作权侵权行为日益泛滥的危险。

2. “把关人”角色失范

库尔特·霍尔指出：“信息总是沿着含有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在那里，或是根据公正无私的规定，或是根据‘守门人’的个人意见，对信息或商品是否被允许进入渠道或继续在渠道里流动做出决定。”^[5]这里的“把关人”既可指个人，也可指组织。在此基础上，休梅克扩展了霍尔的“把关人”理念，更多地考虑了把关过程背后的文化语境和社会系统等因素。“把关人”模式提醒我们，作为社会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关人”受到各方利益的影响，它并非公正无私，其把关渠道和模式也是在各方讨价还价的基础上形成的。尽管如此，已经经过了长时期磨合调整的报刊等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内容的生产、发行各环节均在编辑等“把关人”的合理控制范围之内。他们通过行使自己的职责，使得整个系统有条不紊地运行。然而，与传统出版的生产方式迥异，网络出版的产业链由数字内容提供商、数字内容出版商、数字技术提供商、网络服务提供商和读者构成，使得原来集中行使“把关”权力的报社和出版社变成了众多“把关人”中的一个。数字内容出版商、数字技术提供商、网络服务提供商共同分享了对内容、技术及流通渠道的把关，“把关人”角色变得泛化，“把关”的权力也更加分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某个环节的“把关人”往往为了一时的私利，故意放松或过度“把关”，这难免会损害其他“把关人”的利益，并引来对方的报复，从而使得整个产业链运行紊乱。

作为网络出版产业的典型代表，电子书产业中很多品牌的电子书移动阅读终端内部并没有装载多少数量的电子书，且内容质量普遍不高；但同时，这些阅读终端又能够兼容很多不同格式的电子书，而且缺乏对相关内容的著作权进行保护的技术控制措施。出于对高质量和丰富多彩的内容的渴求，在阅读终端没有有效设置著作权侵权门槛的情况下，消费者往往通过网络等途径非法获得盗版内容，从而使侵权行为泛滥成灾。如果从因果关

系来分析著作权侵权行为普遍发生的状况，阅读器生产商无疑应该承担很大责任。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阅读器生产商“把关人”角色的失范，在事实上诱发了大量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发生。然而，阅读器生产商亦有难言的苦衷——优质内容的提供需要被授权，而购买著作权需要不菲的费用；如果未经授权而使用内容，则又被视为非法。前者容易导致企业成本大幅增加，影响企业在激烈市场中的竞争力和资本的原始积累；后者若经有关部门查处，轻者影响企业的声誉和信用，重者则容易导致企业倒闭。上述的各种情况，对于发展初期且竞争激烈的国内电子书相关企业来讲，都是不能承受之重。在电子书阅读器的盈利对企业保持足够的诱惑力，而其行为尽管有利用法律漏洞的嫌疑但却在合法经营范围内之时，这些企业对于提供正版的内容或研发并应用预防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技术措施便缺乏动力了。作为数字内容提供商的出版社而言，将著作权价格定得较高也有不得已的苦衷——网络出版物的价格低廉且容易被盗版，更会影响实体图书的发售业绩；即使网络出版工作顺利进行，他们的利润也非常可怜。以阿帕比电子书的销售分红为例，由于方正公司掌握了技术和市场，它获得60%的收益，出版社才获得40%的收益。^[6]在这仅有的不足一半的收益中，出版社还要分大部分利润给作者，自留纯利润不容乐观。因此，他们对网络出版内容严格把关，并倾向于将著作权价格定在一个较高的位置。网络出版产业链各环节存在利益的相互分歧甚至对立的状态，导致了“把关人”权力行使的冲突，加剧了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发生。当然，这也和网络出版产业缺乏一个能够调节各方利益的盈利模式密切相关。

三、网络出版物著作权侵权解决途径

化解“解码者”对制度的解读效果与“编码者”希望制度所传递的意图之间的矛盾，以及解决导致网络出版产业链运行紊乱的“把关人”角色失范的情况，有助于促进网络著作权侵权问题的解决。

1. 加强“编码—译码”各环节建设，发挥制度的“信号”示警作用

德国学者S·K·兰格尔认为，信号是对象事物的代替物——它不仅与其表示的对象之间具有客观的、自然的因果性，而且与其表示的事物之间通常具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著作权保护制度作为一种威慑，警告意欲侵权者如果发生侵权行为的严重效果，实质上也发挥着一种信号的示警功能。加强制度的优化与调整，完善“编

码”环节；营造有利于产生与“编码者”意图一致的“解码”环境，强化制度所表达的“侵权=严厉惩罚”的信号，对于提高犯罪行为发生的心理门槛，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都有着重要作用。

（1）加强制度的优化与调整，完善“编码”环节

第一，提高立法前瞻性，打破制度惯性对资源合理配置的限制。

制度的设置，往往具有历史的惯性，而且这种惯性的大小又与不同地区的文化氛围等因素相关度的强弱各异。同时，不同地区的文化氛围等因素，又会从各个方面对其社会制度的衍变过程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同理，包括社会制度、高新技术等在内的人类知识中的先进部分的创新，往往对已有的社会存在造成冲击；同时，既有社会制度中存在的不适应人类知识中的先进部分发展的内容，势必会制约包括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等优质元素的合理衍变，极大影响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并阻碍先进生产力的解放。^[7]包括网络出版内容、制度或技术等在内的人类文化的创新，常常带动旧有的社会制度设置的更新或提升。但是，现有社会制度中不适用人类文化创新的部分设置，势必也会连累整个社会的提升，并妨碍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不能打破制度惯性对资源优化配置的限制，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生产的无效率，而且会从长远阻碍社会整体品质的提升。

网络出版产业作为一个因技术而生的产业，随着互联网等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和相关科研技术的提升，不可避免会发生一些改变。这些改变包括产业之内部分业务及内容的消亡，也包括产业新形态的激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出版产业不可避免地受到原有制度内滞后因素的惯性拖累，各种隐藏的矛盾也会被先后引发。例如，目前国内多数受众的网络内容消费观念仍然是以免费阅读为主，在许多网站因对受众直接收费而丧失竞争力或直接消亡之后，受众的这种观念得到强化。然而，从事网络出版的众多企业的经营目的，则多数是在不影响企业持续发展的情况下获取最大利润。面对受众的免费消费取向，这些企业进行了规模浩大且长期的受众培育，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起点中文网经营的成功，便是这种努力的明证。然而，社会上众多的团体或个人为便利等原因所开发的便于迅速分享的相关技术及软件产品，在人们固有的“免费使用”观念的推动下，加大了这些软件的使用和传播力度，同时也使得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愈演愈烈。如果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对现有制度实行优化调整，尽量提高立法的前瞻性，使得制度

制定的“编码”过程更加科学，在努力推动人类知识中的先进部分创新的同时，尽量减少其对社会冲击的程度。否则，执法者就只能在原地疲于应付，也会令更多的产业受到原本可以避免的发展桎梏。

第二，加强法律体系的完善，防止“编码”漏洞存在。

根据霍尔的“编码—译码”理论，“编码者”用一些具有明显或隐含意义的符号来建构具有特定含义的讯息，而这种编译是经过精心选择并服务于特定目的的。然而，受众并非全然被动的，他们往往受固有观念或其他因素的影响，对接收到的讯息进行变通解读。在这种情况下，受众的最终理解就与传播者的初衷有些偏差，甚至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与“编码者”的初衷完全背离。

网络传播具有的开放性及交叉传播等特点，注定了网络出版产业不仅要与其他文化产业相互纠缠，而且要在国际范围内与其他国家产生普遍接触，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矛盾和冲突；另外，网络传播中信息发布的低门槛及讯息传播方式的灵活性等特点，也会导致网络出版物在传播的过程中，会发生各种不可测的侵权风险，需要法律制度给予其体系化的保护。这是因为，体系化的法律制度，可以发挥类似防护林带的作用。它不仅可以避免因“编码”过程有漏洞或其他缺陷存在而造成受众“策反”解读状况的发生，而且具有全面威慑作用，有助于规避侵权风险的发生。

（2）营造有利于受众产生与“编码者”意图一致的“解码”环境

梁漱溟先生曾说：“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的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8]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仍然存在，并在信息传播上得到体现。例如，尽管法律制度等各种信息在官方规定的正式渠道中得到广泛传播，但人们仍然倾向于信赖并通过家庭、亲戚、邻里、朋友关系等非正式渠道探求信息，寻求的是各种“法外徇情”。作为一个过度看重并依赖家庭、亲戚等私情而相对轻视法统的社会，其文化传承也影响了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的客观性，并增加了人们逃过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从潜意识里助长了犯罪行为的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乏因亲戚、朋友等私情而导致执法人无为或执法不公的情况。在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执法不公的案例，经过大众媒介的广泛而快速的传播，便会在大众心底产生

一种对法律制度的怀疑和失望。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制度的“编码”过程毫无破绽,制度所传达的信息无比美好和完善,也不会妨碍大众依据现实对“编码”做出扭曲或相反的解读。久而久之,人们便视法律制度如一纸空文,甚至嘲笑法律制度的存在,而致力营造各种人际关系网。这个恶性循环如果形成,对于一个社会制度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保证执法环节的公正、公平,营造有利于大众产生与“编码者”意图一致的环境,有助于驱除影响受众“解码”的不良因素,畅通信息传播渠道,还有利于促进“编码者”和“解码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进程,增强法律制度信号的示警作用,从源头上规避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发生。

2. 注重“把关人”之间关系的塑造,加强网络出版物著作权开发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认为,社会的每一部分都对总体发生作用,由此维持了社会稳定。^[9]波普诺的功能主义视角提醒我们,社会的组成部分恰似人类的身体结构,它们以系统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以其独特功能对整体发挥着良好作用。同时,每一部分也均维持着平衡状态,以更好地维持系统的平稳运转。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网络出版系统也具有同样的功能。但是,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网络出版产业的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相互交织,元素的可变性更强,各个企业更是相互连接、相互纠缠,矛盾和冲突普遍存在。各个环节“把关人”的精力多集中在夺取既有的利益上面,而对网络出版物著作权产品的开发缺乏动力。单纯寄希望于网络出版系统的自发创造功能,使其自身达到完善的地步,需要极为漫长的过程,也无疑是不明智的。要想缩短这个过程,使网络出版产业的自我创造和自我完善功能进一步激发,给予网络出版产业整体而科学的指引是有必要的。

(1) 组建或完善网络出版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规范“把关人”行为。

罗杰斯和金卡特的“传播融合模式”认为,信息的分享导致了一个逐渐走向更多互相理解和增加共识的循环过程,也有利于调和网络内部关系——这种内部关系由通过固定信息流动方式而相连接的个人或组织构成,因此能够提供不中断的反馈;在互相理解达成之前,有好几回的信息交换,而这种循环过程不一定要彻底完成。^[10]组建或完善网络出版著作权管理组织,将各个重点企业的“把关人”吸纳为成员,可以为各个“把关人”提供互相交流的平台,促使信息共享与互动,消除

各种原因造成的传播障碍或隔阂,逐步提高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彼此信任程度,规避了两极分化的风险,促进了各个“把关人”心理上的自我投入和群体目标、群体归属意识的形成,并可以在群体合意的基础上形成或完善行业标准和群体规范,约束不轨的“把关人”的行为,并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了参考,有效促进了行业的自律,激发了网络著作权开发系统自身所具有的自我创造、自我完善功能。另外,网络出版著作权管理组织对外也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一旦侵犯相关企业的著作权,则较易引起自身难以承受的后者所在团体的集体报复。因为集体诉讼中成本的分摊,组织内部单个成员的维权成本大大降低。在面对被侵权的情况时,权利人对侵权方展开侵权诉讼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这种组织的建立或完善,不仅节约了单个成员维权的成本,还对组织外的企业产生了很大威慑,加强了行业规范的自我创造与自我完善,促进了整个行业著作权的保护与合作,为网络著作权的开发和维护提供了保证。

(2) 搭建网络出版平台,提供“把关人”共同行使权力的平台。

麦克卢汉曾指出,媒介是人的延伸。以媒介为核心的社会传播系统越巨大化,结构越复杂,人们对它的控制就越间接、越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合作。网络出版物作为新媒体,其信息传播具有快速、交叉、互动等特点,这虽然极大地延伸了人的功能,但同时也使得间接控制的过程和难度增加,合作的必要性也因此日渐凸显。集合网络出版产业各方力量,搭建一个集技术支持、成果孵化、产业服务等为一体的平台非常有必要。这是因为,网络出版产业链各链条上的企业均可以采用相互投资控股等方式来进行深层次合作,虽然不能完全避免各企业利益的分歧,但却大大降低了各链条上企业利益的互斥性,有效规避了产业链断裂的危险,同时也有助于使整个产业链形成一个富有凝聚力的团体,使得著作权保护成为各企业的一种自觉行动,真正实现各方内容、技术、运营和服务的强强联合。这对于产业链的重组、整合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强化产业产品的开拓,以及产业的自我创造、自我完善的功能,都具有重要意义。

(3) 创新著作权盈利模式,打造“把关人”利益共享机制。

网络出版产业各链条企业利益的互斥性,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网络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究其根本,网络著作权盈利模式的匮乏和各环节“把关人”利益共享机制的缺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出版社改制之前,由于

种种原因，这方面的缺失较为严重。然而，出版社改制之后，各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大大增加，著作权的利用方式和利用程度也大大拓展，这无疑为著作权盈利模式的创新和产业链各环节“把关人”利益共享机制的打造提供了契机。

在诸多盈利模式中，著作权次级交易模式较为契合当今出版市场状况，赋予企业的机动能力更高，因为显得更为可行。所谓著作权次级交易模式，是指在确保交易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之上，交易方式和交易人数的限制均可在不违反协议的基础上灵活处理；在双方约定时期之后，也可以进行一些二次或三次的交易，使得正版内容以多种途径流入市场。^[11]使用该模式，不仅有效地避免部分企业无力购买内容产品著作权的情况，而且以可见的经济利益的方式强化“把关人”之间的“脆弱”的联盟，减弱企业的侵权动机，促进著作权的合理流动及开发力度，而且可以在市场交易中使著作权衍生出其他价值，极大地增加参与交易的各方拥有的著作权价值。例如，一部网络小说的著作权，可以衍生出很多影视产品、游戏产品和主题公园等相关内容，而其中一部分影响力的增加则会凸显其他部分的价值。通过此举，不仅可以避免部分企业坐拥宝山而不知开发或无精力开采的状况，而且可以在增加产品附加价值的基础上促进文化产品的流通和传承，直接推动了著作权交易市场发展，间接促进了整个文化产业的繁荣。

结 语

总之，因技术而生的网络出版产业，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必将面临一系列考验。作为伴随网络出版而

生的网络出版物著作权市场，也必将面临着一系列机遇与挑战。然而，对网络出版著作权侵权问题的研究，并不能仅仅停留在关于保护问题的研究上。因为保护只是手段，目的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我们应该在加强网络出版物保护的同时，加强对其的开发力度，努力促进其所承载的内容的传播与传承。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推动网络出版产业前进的同时，明晰其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3]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关于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法律适用的调研[J]. 法律适用, 2009 (12) : 39.
- [2] [7] 张彦华. 国内数字出版所处困境及发展途径研究[D]. 重庆大学, 2011 : 19-24, 31.
- [4] Stuart Hall.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M].Univ.B'ham.,Centre for Contemp.Cult.Studs,1973:1-19.
- [5] Lewin,K. Frontiers in group dynamics II:Channels of group life—Social planning and action research[M].Hum. Relat.1947:142-153.
- [6] 左健, 孙辉. 复合出版与传统出版社数字化转型[J]. 中国出版, 2010 (8) : 46.
- [8]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 16.
- [9] [美] 戴维·波普诺. 社会学[M]. 李强,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21.
- [10] Everett M.Rogers,D.Lawrence Kincaid.Communication networks:toward a new paradigm for research[M].New York: Free Press,1981:25-40.
- [11] 阎立峰, 张彦华. 大学出版社改制后的数字出版发展对策研究[J]. 编辑之友, 2012 (10) : 22.